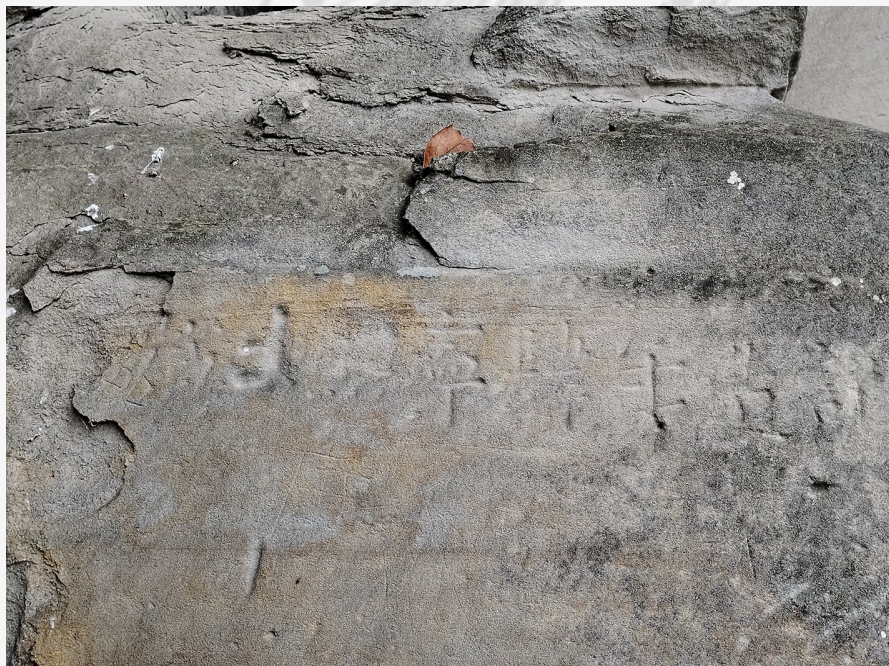


蔡走发现

950年前的横排左起“大熙宁” ——“龙登山”系列考证追踪(一)

2024年4月17日至5月22日,本报“蔡走发现”专栏连续五期,以綦江、江津交界的龙登山为研究对象。这座山上有五通明确纪年的题记,这些题记虽然无关名家,不涉朝政国事,却是距今八九百年前,以今綦江南部东溪赶水交界一带为中心,涵盖渝南黔北地区的,南平军历史文化的切入点。经联系“蔡走发现”主笔杨友钱先生,索要这些摩崖题记的高清原图,一同仔细揣摩,探讨词句信息,斗胆抛砖分享,以表共鸣。



大熙宁肆年造记题刻。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



文化服务志愿者辨识龙登山寺残存立柱碑刻。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摄

罕见的从左到右大横排

龙登山现存两座摩崖崖塔中,较低的一座底部,一眼就看到“大熙宁肆年造记”的摩崖题刻。寥寥数字开宗明义,告诉后人该塔于1071年、北宋仁宗时期建成,距今954年。任何一位金石爱好者,都会激动地睁大眼睛,恨不得再找出几句来。特别是伸手即可抚摸的高度,有缘人颤颤抖抖摩挲过去,总想一个字可以掰出两个来。哪晓得近千年前的古人,同样晓得吊我们的胃口,刚架墨就杀了角,让原本等待找到

他高谈阔论记录的愿望瞬间就落了空。

不过,这七个字虽少,但却是从左到右横排书写,一气呵成,与当今无异。

近代及以前,汉字主流都是从右到左的竖书方式。即便如都江堰青城山“天下第五名山”、綦江凤冠山“綦风土气”等大字题刻,或“胡考之休”等坊表、“义门世家”等门庭匾额,或众多功德碑顶部的“永垂万古”“同结善缘”,虽然也看似一个横排,从本质上来讲,他们都是受制于书写本体及载体的大小,只能

按一字一列的特殊竖式书刻。这可以从东溪节孝总坊中门横梁10列文字“大清/光绪/十七/年辛/卯八/月诤/取陈/时若/时宜/谨竖”,可以类推。其实是文字较多需要分成两排时,就会回到从右到左的竖列排版。

经向杨友钱先生了解,在“蔡走发现”的田野调查中,也发现过近代及以前的从左至右竖书特例。比如川黔古道篆塘段的清光绪罗家坟一下联两列,“高峯峻岭马口壩前/砂笋勇左侍右朝”。还有

南川区峰岩乡的清同治翰林院孔目牌坊仿卷轴下联四列,“青黄碧/绿山中/不琢文/章”。但再一比对各自竖列上联,“曲案横溪鱼拦桥上/客往来前歌后舞”“泉石烟/霞眼底/天然画/图”,又都是从右至左的竖刻,就明白其是因为传统的对称美学使然。从左至右横书的近代及以前实例,也是因为对称。比如“坤向”“虎踞”“秋尝”是从左至右,相对应的“艮山”“龙蟠”“春祀”则反之为从右至左。这两类都与左起横排书写的尝试无关。

特殊的宗教场境左起笔

文观点不谋而合。

《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》一文也明确,“只是梵文佛经从左往右横写,而石刻左行绝大部分是从上往下竖写,但也偶有个别石刻采用与梵文佛经完全一致的左行横写格式”。但该文例举的左行书写共258例,涉及佛教碑刻93例、题记与诗文题刻103例、丧葬碑志62例,明确为左起横排的仅有河南洛阳、陕西富平、河北正定、四川广元、浙江绍兴共五地的《张大娘等七人题字》(“张休庆”三

字左行)、《严景明等二人题名》(“严景明敬造”五字左行)等11个,且均为局部表现,而非全文。

即便《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》例举的,开元十年(722年)刊立的《大卢舍那像龕记》“碑高四尺,广二尺三寸三分,共二十行,行二十八字,左行”。经核实拓片,应是“共二十列,列二十八字”,该碑同样为左起竖刻。由此重新审视该文例举的左起横排11例中“‘几’行左行”,及有可能是“几列左行”的归类错误,更

与左起横排无关了。

目前,笔者还未查到全文左起横排书写的近代及以前碑刻案例。由此推判,“大熙宁肆年造记”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左起横排碑刻首例。此碑刻在龙登山上承北宋,下至民国的十来通纵列文字,从右至左垂柳鱼贯的摩崖石刻群中,独领风骚近千年,体现了南平军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独特性,从根子上说是这一地区民族融合,文化包容思想体现的物化具象。

唯一的敬词巧用年号前

明朝学者朱国祯的《涌幢小品》卷二“国号”条中记载:“国号上加大字,始于胡元,我朝因之。”“其言大汉、大唐、大宋者,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。”很多人据此得出结论,影视剧中宋及以前的皇帝振臂高呼大汉、大唐、大宋,是自我意识膨胀到自信、自负,而闹出的笑话,来批评编剧不懂历史。

其实不然。经杨友钱先生向甘肃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、《伏羲文化》杂志编辑王文清先生,定居杭州的河南沈丘县政协文史委员李珂珂先生请教,两宋的传国玉玺上刻的就是“大宋受命之宝”“大宋受命中兴之宝”,特别是著名的“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:共遵诚信,度守欢盟,以风土之宜,助军旅之费,每岁以绢二十万匹,银一十万两”数句可看出,宋代皇帝也自称大宋。

在历代金石中,也有前面冠以“大”的。比如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,由翰林学士石中立撰写的《大宋新修西京永安县会圣宫碑铭并序》。

作为时间前的“大”字,《汉语大词典》的解释是,“用在时令、时间或节日前表示强调。”比如大年初一、大夏天、大喜的日子等,都是用在特定的较短时间段前。

但“大熙宁肆年造记”,是在年号时间前加“大”,却绝无仅有。不但历代金石中没有先例,连古文献中也没有类似记录,这是南平军人民在生活中对语言文字的创造性贡献,可以作为对汉语字词使用注解的一个新补充。

时间前定语的创新使用

“熙宁”,出自《尚书》“庶绩咸熙”“万国咸宁”。是宋神宗赵顼的第一个年号,从1068年起始用,至1077年止,共计10年。从字面意思来看,反映了皇帝赵顼追求光明、和乐、安宁的治国理念和文化取向。从实际用途来讲,表达的是一个时间段。本题刻后缀以“肆年”,指向时间更具体。因此题刻在前面冠以的“大”字,也是表达强调之意吗?

回到熙宁四年(1071年),北宋王安石变法已推行两年,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条约、募役法、保甲法、方田均税法等陆续颁布,并改革科举制度。一时间,人民负担大幅减轻,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显著改善,社会治安持续向好,读书人的发展路径更为广阔,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繁荣景象。渝南黔北地区的百姓对此深有体会,特意在年号前冠以“大”字,绝非单纯的强调,而是饱含着对时代的由衷敬意与欣喜之情,更是南平军民众在蒸蒸日上生活中,对美好未来充满期待的生动写照。

在汉武帝创建年号制度以后,直到明朝采用一世一元制,其间的王朝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。最多的武则天,在位21年就有18个年号。北宋127年9位皇帝也有35个年号,仅有仁宗天圣、神宗熙宁两个年号使用至第十年。导致皇帝频繁更改年号的重要原因就是灾难出现,需要更改年号讨个好彩头。北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等载,宋神宗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出世,是因为熙宁十年的大旱,而“诏议改元”。由此反推,熙宁年间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繁荣。

回到本例,南平军地区的民间书者,在“熙宁”年号前创造性地冠以“大”字,既表达比普通的敬意更深一层——特别的敬意,也是向下包容、百花齐放的宋代文化高度发达,在西南腹地的底层体现。

(未完待续)

通讯员 王洪林

齐心做好文物普查 合力共筑文化自信